

他者和自我：《海与毒药》中的日本国民性分析

李子丹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2)

摘要:自我的构建离不开他者,自我通过他者的认同而实现,在拉康镜像理论的指导下,从“自我”和“他者”的角度分析《海与毒药》中日本的国民性,折射出二战时期日本人血液中流淌着的服从精神、自我意识的缺失和集团主义,为研究远藤周作的小说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关键词:镜像理论;《海与毒药》;日本国民性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远藤周作(1923-1996)是日本战后“第三新人派”的作家之一,其代表作《海与毒药》一经刊登就引起了日本媒体和学界的关注,这部取材于真实历史事件、体现日本战时国民性的悔罪意识小说塑造出日本人的“基督形象”,对生命百态、社会发展、人伦历史进行深刻反思和沉重自问。围绕《海与毒药》主人公胜吕二郎的自我构建问题,尤其是以主人公为视角,如何理解日本战时的人物建构至关重要,如何诠释小说中的种种现象?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镜像理论”为解读和剖析这部小说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换言之,就是如何用拉康“镜像理论”中的“他者”和“自我”来分析和研究日本战时青年一代麻木、冷漠的国民性。

一、镜像理论介绍

拉康在弗洛伊德“无意识”的理论基础上,吸取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创造性地提出了“镜像理论”,他认为意识的确立发生在婴儿前语言的某个瞬间,当一个6—18个月大的婴儿第一次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影像时,虽然还不能脱离父母的照顾,但是他已经逐渐地认识到镜子中的影像就是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婴儿对镜子中的影像经历了“他人-自我”的认知阶段,在这个阶段,婴儿充分地认识到了自我,并确立“自我”和“他人”的对立。简而言之,婴儿认识“自己是谁”是建立在认识“他人是谁”的基础上,“他人”成为了婴儿认识“自我”的渠道,“他人”也成为了约束“自我”的行为准则。自我的建构离不开自我的对应物——他者,即来自镜中自我的影像,自我通过与这个影像的认同而实现。^①

“主体”(subject)是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聚集的中心。这里的主体已经不再是人文主义者、启蒙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以至于存在主义者所理解的那种与自然对立,带有人类学本体论性质的能驾驭语言的认知主体,不再是一个正常运转的笛卡尔式“我思”的理论机器,而是一个分裂的矛盾欲望主体,这个主体在话语中现身,并在话语中与自我、他人相对立又相互依存。^②强大和无处不在的外部引力假手社会地位、名望和金钱,制造出种种“话语”,这是一种现实中不在其位,幻想中却应该居有的空位,这些空位常常着落到一些成功人士(理想中的自我)身上,狂妄者倾向于将这些成功人士视为自己的理想自我和内在心像,并依靠这种理想化的张力支持“主体”我的存在。

这一理论有助于剖析《海与毒药》主人公的身份构建,并解释在日本固有国民性“他者”的媒介下,以他者认识作为自我的反射,并且折射出战时军国主义对于当时年轻一代的麻痹,由此可以看出远藤周作对战争的反思,及对存在于日本国民性之中的文化糟粕的批判。

二、远藤周作与《海与毒药》

^① 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20.

^②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470.

《海与毒药》一经刊登就引起了日本媒体和学界的关注，获得了新潮文学奖、每日出版文化奖，该小说的创作素材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讲述二战末期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部在军方的授意下，利用八名美军飞行员进行活体解剖实验。

小说的开篇是战后的东京近郊，叙述者“我”是一个向往安稳生活、没有上过战场的普通人，搬家以后发现身边的普通人无一例外不仅未对战争充满厌恶，反倒都对战争抱有热情，在“我”思考为什么普通的人可以做出如此残忍之事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位毕业于名牌医学院却屈身于小诊所的医生，由此引出了小说中远藤周作着墨最多的胜吕二郎。胜吕出身寒门却成绩优异，他身上有着医者的人性关怀，随着战争的深入和医院高层人员的权力斗争，他被迫参与解剖美军俘虏的实验，他本可以拒绝，但是最后还是别无选择地成为了实验里的一份子，对医学的敬畏之心也逐渐丧失，最终胜吕走向了内心的深渊。

与胜吕相对的是同级研究生户田，户田出生医疗世家，家庭优越，他依仗自己的身份从小做出许多罪孽深重的事情，不仅不以为耻，反而把罪责全部归咎于他人。他不相信道德和良心，只相信社会的惩罚。参与“实验”的护士上田看似微不足道，却通过人体解剖的肮脏勾当完成对出轨丈夫、刻薄上司的报复。远藤周作选取这三个普通的人物共同构成了日本的精神内核分析，提取其中的麻木、冷酷、丑恶，提炼成“毒药”。

三、镜像理论下的日本国民性

小说中的胜吕自从做完人体实验后，就丧失了对医学的精神追求，埋名隐姓地在东京郊区成了一个保健医生，当被叙述者“我”窥探到内心的秘密之后，他低沉而疲惫地自语道：“我别无选择。那个时候确实迫不得已，可即使是以后，我也没有自己做主的自信。如果将来又遇到了同样的处境，我或许终究还是会做那件事。”^①在手术之前没有人强迫胜吕参与这次实验，他有足够的时间拒绝参与，为什么他会觉得迫不得已呢？

与其说是胜吕性格的懦弱，不如深究胜吕一代青年人性格中日本国民性的根源，早在德川时代武家的戒律中就提出了“非礼法权天”，权威、权利虽然服从天道，但在人类社会里，它强于法、强于理，逆其而行则不安分。这样的认识从德川时代至今，虽然形式有变化，却根深蒂固地留在日本人心中。

（一）服从精神

在德川时代，西川如见把荷兰的自然科学及思想精神介绍到了日本国内，提出：“总之，下民非治民之任，治于人者唯平常心专之，且不可有些许计谋之意。”^②对于明治政府的领导者来说，把这种无条件的服从精神灌输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是维持他们统治的一种特殊手段。1890年，日本颁布了《教育敕语》，其开篇写道：“朕唯我皇族皇宗，树德深厚也。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世济此美德。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不仅为朕之忠臣良民，亦足以显扬尔祖先之遗风焉。”^③日本的教育从小学开始就需要学习“要时时听从天皇陛下的话，天天拜谢天皇陛下”，从小被灌输“效忠天皇、忠君爱国”的思想，服从精神应运而生。这种服从精神直观反映在日本的官僚阶级、警察、军队之中。民间的研究人士通过进行社会调查和报纸舆论调查，得出大多数的结果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甚至还有人曾经专门编辑了一部社交宝典——《结交人的方法》。当面对官僚时，书中总结出八条准则：“1、始终低头赔礼；2、不辩解；3、表感谢之忱；4、有慰其劳苦之心；5、敬请关照；6、莫以一般友人对待；7、更不可以公仆对待；8、使双方关系亲密无间。”^④因此可以轻易看出日本国民对于政府官僚机关的服从，国民通过政府官僚作为自己顺应社会的一个重要渠道，使“他者”作为交际准则约束“自我”，通过“自我”向“他者”妥协的过程完成维持

^① 远藤周作.海与毒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25.

^② 南博.日本人的心理 日本的自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8.

^③ 吴雄.试述析近代日本天皇制及其政治作用[J].经济管理者,2010:8.

^④ 转引自南博.日本人的心理 日本的自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1.

与官僚的平衡关系。至于警察和军队，它们能通过最短的时间彻底制造出最服从命令的人。军队通过暴力的方式强制士兵服从，让服从的习性完全根植于士兵的心里。这种服从精神最大限度的抑制了个人的意志，扩大上司的尊敬地位。简而言之，军队是抹杀自我精神、制造机械化应令而行习惯的场所。随着时间的深入，服从精神进一步发展，从最初有疑问到最后机械执行，自我精神逐渐丧失，军队精神也成了一种“无我”的状态。服从精神一旦形成，士兵听命上司，将义务内化。

服从精神主要表现在和比自己地位高的人的交往活动中，而和自己平级地位的人交往时，往往采取“八面玲珑”的交际方式。为了使“自我”具有合理性，在和自己平等地位的人交往时，“自我”害怕和“他者”产生纠纷，往往都以“依您高见”而遵从。这种日本人的谦逊和气并不是他们真的在性格中遵从儒家礼节，是一个善于倾听的国度，实际上这是日本服从精神这一国民性特征投射在日常生活中的畏畏缩缩和犹豫不决。日本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身份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他者”以种种媒介进行沟通和交流，从而塑造出一个符合规章制度的“自我”。

一方面《海与毒药》里的胜吕面对自己上级的提议，尽管不想参与其中，但是其内心逐渐形成的“服从精神”使他没有勇气拒绝上司；另一方面，自己同级的户田一口答应参与实验，胜吕八面玲珑的处世之道不能让其驳斥户田的观点，只能畏畏缩缩地答应参与其中。

（二）自我意识的缺失

服从精神的发展一方面制造自动服从权威的习惯性，另一方面阻碍自由地自我发展。日本人常被认为缺乏主体性，没有确立自我。这里说的自我不仅仅是一个侧面，主体的自我简称“主我”，是自我的一面；与此相对，自我的另一面不是主体而是客体，作为对象的自我，不是能动的而是被动的自我，这是与“主我”相对的“客我”。^①

主我是主动行动的自我，不言而喻，客我是被动行动的自我、被视的自我，也可以直接概括为是被动的自我。当“主我”显现出软弱时，往往胆小、羞涩；当“客我”显现出软弱时则是顾虑他人的感受、自我畏缩怯懦。人们兼有“主我”和“客我”，两者相互渗透形成复杂的自我。当开始在意“别人是如何看待我”、“别人对我的做法会有什么批评”时，就出现了介意世面的世面意识、介意面子的面子意识，“自我”就以他人为中心、依赖他人的本位倾向。在日本的国民性构成中，常常是“客我”的意识过强，影响“自我”的意识，以至于认为自己是劣等者，因此总是觉得别人做的都是对的，自己如果和别人不一样就是错的。这和拉康的“镜像理论”不谋而合，自我的发展总是不同程度受到他者的影响，当自我意识出现缺失，“他者”就成为了自我的唯一准则，成为其在为人处世中一条必须遵守的铁律。

日本二战期间，受到军国主义的影响，在其本国服从精神的基础上加剧了自我意识的缺失。日本国民通过各种民间活动对天皇表忠，把绣有“效忠天皇”的慰问袋发送给士兵；日本女性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节成为慰安妇，自愿把自己的青春和贞操献给军队；母亲鼓励自己的孩子走上战场为天皇尽忠，并且教育孩子如果不幸成为俘虏就剖腹自尽；就连日本的僧侣也离经叛道助纣为虐，日本国内的神职人员强烈要求参与战争，并鼓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狭隘的军国主义抑制了日本国民性的理性发展，因此不允许日本国民个性的张扬，而大胆支持自我主张的人往往被孤立。因此母亲怂恿儿子上战场，僧侣也杀人如麻。

社会通过特有的信息操纵社会心理，使自我划一化、平均化地发展，被平均化的个人，担心在平均化的集团中被孤立于伙伴之外，这种害怕促使产生了自我不确实感，也使自我意识不断流失。在《海与毒药》中，胜吕畏惧自己的上司，而自己的同学户田毫不犹豫地同意参与，直接导致他内心的怯懦。他害怕自己成为与众不同的人，只能忽略“自我”，服从“他者”，成为了那场人体实验的帮凶。因此胜吕内心深处明知道这样做有损人道主义，但是如果不选择向大多数人妥协，他会成为不被其他人接受的异类，最终只能“自我”向“他者”

^① 南博.日本人的心理 日本的自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83.

妥协。而作为胜吕同门的户田，一次次游走在道德和法律的边缘，他意识到法律没有办法制裁他，而道德也并不能约束他，索性丢失自我随波逐流，成为了二战法西斯主义的帮凶，同时也因为丧失了自身的人格成为了法西斯主义的牺牲品。

（三）集团主义

自我意识的缺失产生的不确定感通过什么方法可以平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依附集体。集体对于它的成员来说，是超过成员个人能力之和的存在，它能够影响成员的心理，促使人行动。有俗语道：“一个日本人是一条虫，一群日本人是一条龙。”当一个人时他谨慎谦恭，当成为一个集体时便雷厉风行积极主动，这源自于集团内部的向心力。这种情况下自己做的决定所带来的部分责任被集体决定的集体责任吸收，因此自己在集体中找到了归属感。日本人的自我构造从一开始就是自我和集团结合在一起的，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封建身份等级制度中，只有遵从身份的等级，对上层人唯命是从才能获得内心的安定，这种等级意识在不准确立自我意识、否定自我的状态下形成。尽管明治维新废除了等级秩序，但是新的等级秩序替代了旧的身份制的等级意识。

对于日本人来说，与其说集团是主持自我的场所，不如说是同化自我的场所，自我的一大部分被集团同化，从而形成“集团我”的意识，“集团我”被置于“自我”的背后，成为了自我心理的支撑。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的自我以集团一体化为媒介，从而使“自我”不断地扩大加强，于是人们认为集团的决定力量就是自己的决定力量，集团的实行力就是自己的实行力，而“自我”可以通过集团得到强化，这样就能消除“自我”的不安。而“集团我”的最高境界就是“国我”，也就是所谓的国民义务。大部分日本人把个人的自我从属于“国我”，形成了一个坚定的命运共同体。

小说里的胜吕、户田、护士上田都是平常的普通人，既不是权力掌握者也不是军队里的军官，他们是代表着日本普罗大众的基数。对他们而言，参加人体实验没有任何好处，他们不会升职也不会加薪，但是一旦一个团队形成，就需要有不同人构成这个团队的不同角色。团队需要一个想获得更多利益的领导者就有了医学院院长，团队需要一个观看者就有了军官，团队需要一个执行者就有了胜吕、户田、上田。胜吕也好，户田也罢，他们都是集团中的一份子，他们也是执行集团决定的推动者。因为存属于这个被认定的集团之中，“自我”从参加这一集团的“集团我”中得到了支持，从而可以从中解脱，消除自我的不确定，正因为如此，这些人可以冷漠绝情地参与人体实验。日本国民性的“集团主义”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准则，也是一条社交原则，在构成日本国民性格的时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日常国民的交往，自我只能是出于想象关系一方位置上的自我，除此之外根本不存在纯粹独立存在着的自我。自我借助于他人而诞生、而存在，这是自我对他者的依赖性；而作为集团统一形式出现的自我，以为自己的存在不依赖于他者，反而想象着把一个集体合进自身之内。换言之，自以为自身是独立的，殊不知自身并非真正独立的或具有真实的自我意识形态。

直到今天，日本人的集团主义仍然存在，企业、家族、社团、俱乐部等成了一种新的载体，是日本人自我向集体投靠的新场所。他们仍然非常重视自己隶属于哪一个组织，如果不能加入某一个团体，就会使他们感到不安，只有将自己完全融入在集团中，他们才能找到“自我”的位置和价值。

四、结语

“认识你自己”，这句箴言镌刻在古希腊阿波罗神庙殿墙上，在哲学发展的漫长岁月中这始终是哲学的基本目标，自我成为一个需要反思和证明的对象。复杂的社会环境营造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为展示复杂的他者形象提供了可能性，也在这一层次上出现了主体与他者相关联的概念。拉康认为，自我是想象出来的，只不过是一个从根本上被分裂的实体。^①拉

^① 方汉文.后现代主义文化心理 拉康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113.

康的镜像理论为分析《海与毒药》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切入点，正是在“自我”和“他者”的影响下，胜吕逐渐丧失了自我，成为了日本国民性的牺牲品，折射出渗透在日本人血液中的服从精神、自我意识的丧失，也为后续从镜像理论研究日本国民性找到有力佐证，成为认识“自我”和“他者”新的延续。

参考文献

- [1] 远藤周作.海与毒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 [2] 南博.日本人的心理 日本的自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 [3] 南博.日本人论 从明治维新到现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4] 马元龙.雅克·拉康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 [5] 方汉文.后现代主义文化心理 拉康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 [6] 赵一凡.西方文论讲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 [7] 张一兵.拉康镜像理论的哲学本相[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0).
- [8] 史军.远藤周作对基督教的日本式解读——以《海与毒药》和《沉默》为例[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04).
- [9] 于荣胜.远藤周作的《海与毒药》与日本人[C].日本研究论集,2006.
- [10] 韩芬.日本国民性与侵华战争关系的解析[D].南京师范大学,2012.
- [11] 刘灏霖.远藤周作《海与毒药》论[D].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

Other and Self: An Analysis of Japan's Nationality in Sea and Poison

Li Zid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Abstract: Self-construction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other, and self-realization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identity of the other. Under the guidance of Lacan's mirror theory, this paper analyses Japan's national character in Sea and Poison from the angle of "self" and "other", which reflects the spirit of obedience, the lack of self-consciousness and collectivism flowing in Japanese blood during World War II. I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Shusaku Endo's novels.

Keywords: Mirror Theory; Sea and Poison; Japanese Nationality

作者简介(可选):李子丹,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